



盖壤 / 著
李昌懋 / 整理

日记情书

卷三

著者 芳

年

激扬岁月 文学实录
大道家圆 求索在途



美国南方出版社

盖壤 著
李昌懋 整理

日记情书 著者 芳 年

卷三

美国南方出版社



日记情书著芳华（卷三）

盖 壤 著
李昌懋 整理

责任编辑：向 辉
装帧设计：金石点点
题 字：盖 壤

© 2026 by Ruxiang Gai & Changmao Li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6年2月DWPC第一版

开本：240mm x 170mm
字数：283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2026932001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6932001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978-1-68372-808-5



作者简介：

盖壤，实名盖如翔，1936年4月3日生，中共党员，辽宁丹东人。曾在蛤蟆塘小学、丹东中学、丹东第一高中就读，1961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本科。资深编辑，编审。1960年入职辽宁人民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后，从见习编辑做起，历任编辑、编辑室副主任、编辑室主任，1988年起任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至退休。1986年加入辽宁省作家协会，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辽宁省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持编辑出版了《五千年演义》、“小学生文库（品德教育类）”、《中国当代寓言文学大系》等有广泛影响的图书。1956年开始发表小说，著有《太阳孩和小绿裳》《小将罗成》《盖壤童话百篇》《小不点童话百篇》《故事大王智斗蓝鼻子》《中国俗语故事集》《中国熟语故事海》等小说、童话、故事作品，责编的图书和个人著述27次获得包括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中国图书奖等在内的全国和省级奖项。1993年获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编辑荣誉证书，入选中宣部出版局编辑出版的《编辑家列传》。



整理者简介：

李昌懋，1992年2月24日生，中共党员，辽宁沈阳人，1998年起在沈阳北陵大街小学就读。2004年起在东北育才学校就读，2014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2023年6月获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起在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从事“水木学者”博士后研究工作。在《文艺论坛》《当代作家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学术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代表作有《嘉绒语与阿来创作关系初探》《视觉中心主义的当代性历史书写——论李硕历史非虚构文本〈鬻商〉》等，研究方向为文化批评与中国当代文学史。

卷三

目 录 M U L U

第七章 求实年，双向度（1961·日记）—911

- 一一一 左顾右盼过年关—920
- 一一二 初辨共产风—927
- 一一三 大办农业，整风整社—932
- 一一四 先当学生，后当先生—941
- 一一五 两个贫农的生活点滴—949
- 一一六 胆识的历练—956
- 一一七 一分为四，不大而公—963
- 一一八 成长的快乐—970
- 一一九 一见钟情的感觉—979
- 一二〇 朝气、理性和信念—990
- 一二一 心里有阳光，日子很温暖—997
- 一二二 自立自强，与时代同步—1002
- 一二三 责编的第一本书—1010
- 一二四 爱岗的习惯很平常—1018
- 一二五 在关怀中前行—1022
- 一二六 学习社会活动—1027
- 一二七 年尾的笑声—1033

第八章 自供岛之恋（1962·日记、情书）—1038

- 一二八 工作圈，朋友圈—1043
- 一二九 自省自律很必要—1050

- 一三〇 将军、部长各不同—1056
- 一三一 新的考验—1062
- 一三二 表达意愿，服从安排—1067
- 一三三 爱的志忑—1074
- 一三四 那头是美女，这头是田园—1082
- 一三五 五月情书—1089
- 一三六 剪不断，理还乱—1097
- 一三七 何以解忧？哪有杜康—1104
- 一三八 六月情书及其他—1111
- 一三九 朋友暖心召月圆—1120
- 一四〇 无奈的楚歌—1126
- 一四一 何日见许兮，慰我彷徨—1133
- 一四二 七月情书—1139
- 一四三 恋爱与劳动伴行—1153
- 一四四 八月情书及其他—1157
- 一四五 希望的九月—1165
- 一四六 喂马、读书挺好的—1171
- 一四七 九月情书—1179
- 一四八 一吻能否解尴尬—1185
- 一四九 十月情书及其他—1193
- 一五〇 你爱捧回爱你的—1202
- 一五一 十一月情书—1211
- 一五二 热恋中的守望—1221
- 一五三 十二月情书—1227

第九章 运动年代的自塑与众塑（1963·日记、情书）—1234

- 一五四 一月情书及其他—1239
- 一五五 旧情常扰定情时—1245
- 一五六 讨厌波折偏波折—1252
- 一五七 二月情书及其他—1256
- 一五八 适应环境，学习雷锋—1268

- 一五九 三月情书及其他—1274
一六〇 婚前婚后—1285
一六一 良缘家书—1293
一六二 集体是一面镜子—1301
一六三 三省吾身—1309

第七章 求实年，双向度（1961·日记）

—

1961年，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大跃进”以来的失误进行纠正。上年11月，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毛泽东说1961年是实事求是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解决吃饭问题。我参加了工作队，到农村开展反“五风”、整风整社。

这次执行的任务，是从中南海到生产队，一竿子插到底。

毛泽东当时的想法是：“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实际比1958年还厉害。原来估计1960年会好些，没有估计对，1960年有天灾又有人祸，我们的工作是有错误的。突出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调劳力过多。我们很大一部分积累是来自农民，是不等价拿来的。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糊涂人对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都不清楚。浙江省几十个县委书记，只一个人清楚，这么多人搞不清楚，就是我们的责任了。”（《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507—511页）这段话说明，出现共产风的原因有两个向度——上面的失误，下面的糊涂，解决问题也要从两个向度入手。

如果联系个人实际，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驯服工具当惯了，上面怎么说，我们就怎样做，没有独立思考，实事求是。以我和这次一同下来反“五风”的老刁（就是我刚到出版社跟我夜谈的那位编辑大哥）为例，我刚进出版社时，就赶上反右倾，我跟着批判关于人民公社按劳分配的小册子。小册子本来是抵制共产风的。会上老刁也做了批判发言。刁兄是老东北大学学经

济的，曾是省委宣传部讲师团的成员。五九年我曾对共产风根源认识不清，下来反“五风”后，我问老刁对共产风怎么看，他说：“这个问题得具体分析。叫共产风是坏了共产主义的名称，实际就是小农的平均主义——平均风，有的是坏人搞的，有的是上面压的，有的是思想上糊里糊涂的，不能笼统而论。”这个看法比较全面。为什么他现在的观点和上年不一样了呢？说明我们这些干社会主义的人，根本没怎么弄懂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在，上头的风向有变，我们这些对不发达社会主义似懂非懂的大编辑小编辑也跟着变，编辑本来就是党的政策的宣传者，政策有变，会出现计划不如变化的现象，需要思想急转弯，这是由党的新闻出版工作的性质决定的。探索年代政策变得快是常有的事。当然，正确的认识，根本途径还是下基层接触了实际，能够实事求是地从上、下两个向度来观察和处理问题了。双向度并非平分秋色，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群众的实际生活和人心的向背，而问题的解决则需要上头下决心。

二

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政策对了是这样，政策错了也是这样。对干部，不光看他怎样说，主要看他怎样做，这也是双向度。这次下乡，头二十天的日记能看出我身边干部的思想作风和政策水平，一定程度反映了当年部分干部的生态。

出版社下来了四个人，到县以后，工业编辑室主任找个借口退了回去。剩下三个人：老刁、刘副总编，还有我。

刘副总编伪满时是个文学青年，曾参加中共东北抗联地下组织，被日本人逮捕，关进齐齐哈尔监狱，遭受酷刑。审问他的那个日本宪兵叫土屋芳雄，改革开放后来华与刘见面，两人合写了一本《人鬼的角逐》的书。刘当年受刑落下了残疾，走路时小腿像机器人。刚下来那天，他坐花轱辘车嫌冷，就跟在车后面小跑，那一抖一抖的步伐，看上去令人不忍。

到县里，我们三人同住一个屋。我望着刘副总编说：“能不能把中央的‘十二条’文件给我看一下，下去好宣传。”文件只有他。他眉头一皱，说：“那是党内文件，非党同志不能看。”我望着老刁，是求援的意思。老刁的浮肿病比我重，眼泡肿得厉害。他微笑着对刘副总编说：“又让马儿跑，又让



马儿不吃草，怎么行？”刘副总编瞪了他一眼，嫌他多嘴。转脸对我说：“我给你传达一遍！”我说：“行。你慢点念，我记一下。”他说：“别记了，仔细听。”事后老刁对我说：“没见过这么教条的领导！”我点头谢他的好意，说：“忘了什么时候，他说他做地下工作有一句话：‘我们的纪律是铁的。’”老刁说：“现在又不是地下，况且，中央要求把‘十二条’传达给每个社员，工作队员不先掌握，怎么传达？”我说：“他是为了谨慎吧。”老刁摇摇头，说：“原则有余，灵活不足。他每天早饭必须吃一个西红柿，为了健康，雷打不动。有一天上班，路上突然想起忘吃了，走二里地折回去，狠咬了西红柿一口，拿在手里，一面吃，一溜小跑来上班。”我憋住了笑。副总编是对上负责，老刁是对下负责。说了算的以两头都负责的方式，平衡了三个人的意见。说不清他是机智还是死板，总之，没错就是了。

隔不几天，老刁就跟我讲了另外一件事：毛泽东1930年写过一本《反对本本主义》的小册子，遗失多年，现在找到了。赶上求实年的工作需要。小册子里写道：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消极怠工的最妙方法……小册子旗帜鲜明地反对形式主义的“上级观念”，与毛泽东反对当驯服工具的精神是一致的。

反“五风”的带队领导都有个调查研究的任务，一方面是上情下达，另一方面，要把调查研究得来的情况向上级报告，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双向互动的工作做得如何，决定了互动的效果。这次来昌图的省委工作组带队的是省畜牧厅长，他把调查任务布置给刘副总编，副总编又把任务布置给了刁编辑，老刁给我讲了这样一个磨磨叽叽的故事：

他们二人被分到了大兴大队。这天，副总编到老刁的驻地，说：“你写一篇经济兑现的材料。”第二天，副总编又来了，说：“你考虑考虑，明天写出来。”第三天，刘又来了，说：“你写一份大兴队一般情况的材料，提供看法，供决策之用。”

三天三令，只为向带队的厅长作汇报。老刁把材料写出来了。汇报后，厅长找老刁问：“怎么的？也没提出什么问题来呀？”老刁觉得是挨批评了。



原来厅长没有亲自搞调查，而是等下面把做好的菜端上来，让他来发表品尝意见的。他本来应当亲自动手去搞调研；自己不想动手，也应当把调查的内容和要求说清楚。但他只把任务往下压。过场走完，提不出问题，厅长也没深究，因他老婆要生孩子，打马回城，舍大家顾小家去了。

还有一位老资格领导，在县里介绍情况的大会上，说农村的大酱很鲜，里面有维生素。他的意思是说，社员分够做大酱的黄豆，就不缺维生素了。其实，大酱里只有少许核黄素，其他维生素都是个零；再说，肚子都吃不饱，哪顾得上维生素？唉！盲侃黄豆酱，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之乎？

公社方面，为了招待我们这些省里来的大员，调来四个小姑娘搞接待，要生产队给记工分。幸亏公社书记是个明白人，说这是借反共产刮共产风。

所以，上下双向互动是否顺畅，是否做到了实事求是，要看干部怎样做。这次下来调查研究搞得好的，还是主要的。人民公社政策上的调整，应归功于调查研究。就连“十二条”的内容，也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变动。最大的调整和变动，是把一大二公，调到不那么大、不那么“公”（不搞穷队富队拉平均）。我所在的一一大队经过调整，一个大队分成四个。后来，又经过几番调整，核算单位由大队变为小队，等于退到相当于五五年前的初级社，最受诟病的食堂也在这年取消了。整风整社结束，省委工作队提供了三篇调查材料：即关于食堂、关于整风整社的遗留问题、关于评工记分。遗留问题的调查中，讲到食堂和核算单位大与小的利弊得失；评工记分这个专题里讲了按劳分配。三个调查报告所提供的正确意见，体现在修改后颁布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当中了。取消食堂和大队划小，应该是上面听了各地自下而上提出来的意见得到落实的结果。那篇关于评工记分的调查报告是刘副总编写的，举例不多，却是恰如其分，他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开头他和老刁磨磨叽叽的那点事，恐怕与上级官大一品有关，大官不亲自动手，把任务压到下面，下面又压到下面，双向互动变成了单向传递，无果而终。省委工作组共23人，坚持到最后，只剩下9人，其中，有的是组织安排回沈治浮肿病的，有的是找个理由跑回去的。人数不怕少，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干部是双向互动的主要的责任方。民谚云：村看村，户看户，社员



看党员，党员看干部。真经怎样念，工作怎样干，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干部太重要了。

三

我于是悟到了党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天机了——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在政治、经济、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方面，有一套成功经验，都是双向度的，成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例如：我们应该相信党，我们应该相信群众，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发展经济，保证供给；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成双成对的双向度、符合唯物辩证法。许多错误和缺点的产生，都与双向梗阻与偏离有关。梗阻和偏离的原因，是干部身上存在的官僚主义（调女社员搞接待）、主观主义（大酱里有维生素）、形式主义（调查研究走过场）、教条主义（“十二条”只能听不准看）等有关。这只是举例而言，不是给涉事者做鉴定。双向度的理想目标，是毛泽东提出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个命题五七年就提出来了，到六〇年，三年过去了，还在路上。

我自己在双向互动中尝到了甜头——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我们所在的一一大队定为三类队，原因是原大队支部书记刘金定私宰耕牛，欺压百姓，连年减产。恰在我包的十四小队里发生了宰杀集体母猪的事件。领导叫我把事情调查清楚。调查发现，那母猪是个吃亲生猪崽的恶猪婆。吃了自己的不算，还要吃别的母猪下的小崽。正当恶猪通吃作案之时，饲养员上来一棒，将恶猪打翻在地。经大队批准，杀掉吃肉了。宰杀母猪，是正当惩治，没有问题。我把情况如实汇报，尝到了实事求是的甜头。

工作组组长叫我注意调查大队领导班子的问题。现任书记曾跟前任书记刘金定一起吃过私宰牛肉的，其人出身富农家庭，与原支书是不是有共谋？我调查刘金定的问题时，也同时调查了此人的情况。群众对他的反映较好，说他平易近人，下到生产队，见什么活都干，能与群众打成一片。我如实反



映了情况。工作组将大队定为三类队，主要是前任支书的问题，其他人是教育问题。

但刘金定执政期间的恶劣影响还是要清理的。我所在的丁家窝棚小队会计也是个富农子弟，是通过刘金定的亲信安排上来的。他从初级社的时候起，就排挤贫下中农。任小队会计后，用黄米贿赂公社干部，以食堂为中心拉关系，社员有病，不准到食堂吃饭，其父隐瞒土地，低划了成分。我发动群众对会计进行揭发教育，通过改选换掉了。根据一位老师的举报，还在幸福院里揪出一个坏分子，是幸福院院长，他克扣老人粮食，殴打虐待老人。经批判斗争，戴上坏分子帽子，依法管制。这件事我办得太莽撞，先斩后奏，材料是事后报上去的。

处理会计的问题，比较费气力，因为要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在大学的时候，都是当驯服工具，或者像五八年那样，“大跃进”随大流。现在自己包一个队，工作要自己拿主意，能力、水平都有限，我能解决群众最关切的生活问题吗？有的能，有的不能。畜牧厅一位李处长是五一队工作组组长，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说做群众工作一定要有耐心，犯急躁病容易忽左忽右。

生产队反共产风，小问题比较多，例如调用米袋子、木头杆子、豆腐挂之类。较大的问题，像社队的规模太大、食堂要不要办下去、核算单位是大队好还是小队好等，都需上级来决定。特别是食堂，是共产风的一个基地，粮油的供给部分，早在秋收分配的时候就扣下了。让不让社员吃饭、吃多吃少，都由队干部说了算，不到食堂吃饭，该得的粮油也领不出来。干部管住了食堂，就等于管住了社员的饭碗。食堂管理制度和人员素质，都有些问题。炊事员把吃过的剩菜往锅里倒，菜里还吃出了鸡粪，炊事员偷吃大饼子就埋在灶坑里，结成烟嘎巴自己偷吃。我在上年还写小说歌颂食堂对家务社会化的积极作用，现在认识到，那是一篇跟风之作。下面的同志总是愿意顺着上面的心思讲话，有的省委上年给中央打报告，说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办不办食堂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向度偏到共产风那边去了。现在在这里看到，食堂成了坏干部压迫社员的基地，有病干不了活，就只给二两粮，逼得社员去逃荒。食堂办不办，我决定不了。只能做好分内工作，兼顾分外工作。



我有另一个双向度——是深入生活、反映生活。这方面的收获也很多：例如5月8日、5月9日记，记了社员对食堂的意见，那篇《四人谈话》的日记，很生活。小老太太本来是防着孟秃子来蹭烟抽的，因她对食堂有意见，唠着唠着，跟孟秃子有了共同语言，解除了防线，成了一个战壕的战友，主动把藏起来的烟口袋献出来。这些文字，不论是作为群众反感食堂的细节，还是作为解散食堂的理由，材料都是鲜活的。

由此想到3月13日那天晚上，在揭发小队会计的问题时，我犯了急躁病。我正懊恼会议不成功，晚上回到房东处，房东大哥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600斤！”原来他正在算计自留地的年产，600斤可以解决两个人半年的口粮，加上队里分到的粮食，就不愁再挨饿了。我一下子明白了他为什么会上总也不发言的理由了——小打小闹的共产风与他无关。他原来是队里饲养员，我让队长兑现了他当饲养员时应得的工分补贴，目的是想让他继续当饲养员。可是，眼看队里的牲口喂不好，他还是拒绝再去喂牲口。队长说他是这个队的第一等好人。他还对我的工作给予指导：“你先头话说得太大了，把自己孤立起来了，你得看火候。开会就像赶浪似的，一浪一浪地往前赶……”实际上，他想要的东西并不在会上，而是在自己的自留地和为集体好好干活上。他身上有种质朴的农耕文化养成的乡村伦理和文化基因，那就是：公平、正直、不听邪，不怕吃苦，勇挑重担，问心无愧。这是农村社会主义得以发展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丁大哥是贫下中农原质原味的典型。他需要生产队有一个好的管理者和带头人，帮他解决怕得罪人、见好就收，吃了亏没人撑腰的问题。严重的问题，不仅在于教育农民，也在于满足农民，让他们在革命的参与中受教育并获得，在获得中参与并受教育，这也是个双向度。这个过程，也反映我自己从土改到大学到参加工作的经历，从做好人不做坏人的伦理出发，到有信仰有追求和门里门外的实践，都是在党的教育下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灌输并亲自实践的结果。这和父亲虽然在土改中挨打，却对党没有抱怨，因为当了贫农小组长，他获得了土地、房场，所以要送儿子参军。懂社会主义，干社会主义，做到共同发展，是有盼头的愿景，这是干部和群众的共同认知。好的生产队长从哪里来呢？苗子从革命阶级和社员群众中来。要达到理想的结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啊。

